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六期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11b)

---

【亲历者言】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王知常
【文革一页】	我的武斗经历	丁学良
【口述历史】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上)	程汝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亲历者言】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 王知常 •

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从学校出来后就碰到了文革，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卷入政治，接触到高层领导。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招来了十二年牢狱生活。

现在我将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用。不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造成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个人的认识和情绪的驱使会使记忆发生偏差，我是没把握将我经历文革的事完整准确地讲述出来的，仅凭记忆说吧。

—

我先从在学校里讲起，因为我们是从学校里被党委直接调到写作班去的。1962年我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老师，做金冲及先生的助教。1964年“反修”时，市里要组织“批修”，来复旦找人写文章，最初是写关于中苏疆域问题。学校党委就组织了五个人，以金冲及为主，他是教学科研部副主任。还有历史系的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我，组成了写作班子。开始就在复旦大学写，在资料室里替我们找资料的是姜义华、董进泉，他们两人是我同班同学。文章用的是集体笔名“罗思鼎”，意思为学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罗思鼎笔名的由来。

搞了一段时间之后，1964年5月，市里要我们去丁香花园。那里是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合办的“未定文稿”编辑部所在地，我们简称为“内刊”。去丁香花园之前，复旦党委书记陈传纲找了金冲及、朱永嘉、吴瑞武和我去他在第九宿舍的家谈话（因为朱维铮不是党员，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他讲了两点：一、陈毅调到北京去当外交部部长时，周总理找他谈话，对他说外交部部长授权不大，事事必须请示中央。二、他拿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五十多本一套的《民族白皮书》，这是内部调查，一个民族一本，涉及各个少数民族，也与边疆问题有关。他把书给我们拿去参考。我体会陈传纲的意思是，你们虽然被调出去，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声还是要与学校保持联系，不要人出去了，就不理会学校了。

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为他的老婆丁香盖的，因此而得名。东楼是英国式小洋房，就是原来的丁香花园；中楼是解放后潘汉年在这里扩充造的，现在开放的饭店就是中楼；西楼原本是另外一个资本家的，解放后被并入丁香花园，现在是老干部活动室，不开放的。我们五个人就住在丁香花园里。

内刊的总负责人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也常来，基本每隔一两个礼拜就来一次。魏喜欢写大字，西楼办公室的外面有一个大的玻璃房，他就在那边写字，小警卫员就在旁边给他磨墨。当时我们在西楼办公，晚上睡在东楼顶楼。东楼二楼住着文学组，他们办公也在那里。南京大学研究茅盾的叶子铭也被调来写“反修”文章，住在二楼的小房间。

内刊编辑部常务副主任是周原冰，笔名叫石梁人，来编辑部之前是搞青年道德问题的，也做过市委副秘书长，是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调来华东局政法研究室副主任庞启云，担任我们的第一副主任。排在他后面的副主任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周南。常住丁香花园的负责人就是这三个，石西民每隔一两个礼拜来一次，向我们传达一下上面的精神，讨论内刊的选题。有时，魏文伯也谈些他的看法。开会的地点在现在的中楼大厅，那时用作资料室。

当时丁香花园里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内刊编辑部班子，人员是从华东局和市委政策研究室里抽调出来的。编辑部文学组的组长是姚文元，还兼编辑部副主任，但他这个副主任无实权，因为前面已经有三个副主任了。姚原是《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从那里调过来的。内刊编辑部文学组除姚外只有一个人就是胡锡涛。我们去丁香花园的时候，姚文元不在，他因为生肝病经石西民批准去青岛疗养了。不久，他回来了。我在食堂里吃饭时听他对别人说，在青岛疗养实在没意思。因为那里都是大干部，而那时姚文元还只是17级干部。内刊准备开展批“中间人物”，他就回上海了。胡锡涛是编辑部的人，但他平时与写作班的文学组在一起，因为他也是写手，写文学方面的文章。

内刊编辑部哲学组的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原副处长沈竹，他的太太与朱永嘉是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也去过沈竹家。沈竹后来随石西民去了北京。哲学组的另一个成员是纪树立，原是上海社科院的，他名义上属于内刊哲学组，实则与写作班的人一起活动。

内刊编辑部经济组的组长是钦本立，也算编辑部副主任，原来是《文汇报》的副总编，1989年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他喜欢喝酒，连午饭时也要喝酒。他与我们关系很好，常来我们这里聊天。钦本立要搞美国侵华史，我们就帮他去资料室里找资料，所以他常来我们历史组坐坐。

内刊编辑部历史组的组长是金冲及，好像也挂编辑部副主任的名。内刊历史组原来有个人叫老陶，我们去时已经去四清了。我们那时的身份很特殊，编制上属于内刊编辑部，但也算写作班，写作班的历史组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着金冲及，所以两头都管着。内刊来的历史类稿子都归我们审，我记得审过华东师大李巨廉和艾周昌写的稿子。

还有一套班子就是写作班，也有文、史、哲、经小组。历史组就是我们。哲学组组长是周亢，还有郭仁杰。他们没有住进丁香花园，在外面别的地方写作。

经济组的组长是姚耐，成员有王治平（后来是汪道涵的谋士），还有其他两个人，一共四个人。姚耐来得很勤。他喜欢下棋，围棋、象棋都下得很好，听说陈毅来上海就找他下棋。经济组的其他人不会下围棋，就经常陪他下象棋。

写作班文学组的成员是最多的，名义上组长是叶以群，但不常来，实际负责的是王绍玺，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徐景贤这时是代表市委宣传部联系写作班的联络员，没在写作班担任职务，他要到武康路18号时才任写作班支部书记。文学组有的人替内刊写文章，比如从作协来的李子云和陈冀德、华师大来的苏联留学的倪蕊琴，她们的任务是批托尔斯泰，倪调来就是因为需要看俄文。我对她们三个人印象很深，丁香花园里有一个湖，湖里停着一只小船，她们三位女将经常去湖里划船，可称是“丁香一景”。文学组其他人写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批电影《早春二月》等。有一个写田螺姑娘的动画片，陆定一看了后连说三遍荒唐，于是就要组织批判。李子云原先写过文章肯定电影《北国江南》，后来石西民在中楼开会时，点名让李子云写文章批这部电影。戴厚英和胡锡涛各写过一篇文章批《早春二月》，我还记得戴厚英的文章套用了木兰词里的“何所见、何所忆”。文学组里最活跃的是戴厚英。文学组喜欢开玩笑，喜欢说戴厚英是“才女”，什么人“才子”，不知谁汇报上去，被上头的人批评说风气不好，互相吹捧。

写作班的人比较多，我不是自吹自夸，那时我们历史组一直受到表扬，因为金冲及管得很紧。比如在伙食问题上，他就拒绝拿补贴，他说我们自身是写“批修”文章的，怎么还能搞特权，为了吃饭多拿钱。林雪元对他说这个补贴不是发给个人的，贴在食堂里的话大家都能借点光。结果我们吃了一个半月的补贴后，还是退掉了，仍旧吃一般伙食。我们的任务都是石西民布置的，有批乾嘉学派、批李秀成、批周谷城、写上海一百年这些主题，这也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石西民来找我们写。实际上“反修”的文章就写了一篇，我、朱永嘉、朱维铮写初稿，吴瑞武二稿，金冲及定稿。这篇“反修”的文章是关于边疆史地的，写完就结束了，其余都是石西民临时布置的。我写文章概括不太好，金冲及改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写文章用词还可以，比较活泼，但是概括文章时有些欠缺。”我们的行话称概括为“绕辫子”。我文章写得慢，每天都开夜车，睡觉睡得最少。写批判文章要会“拎辫子”，我不会，毕竟学校里出来的，比较迂。但是我很努力，看书从小就杂，记性也好，有些可以整段地背，这样写文章时材料可以用得广些。

那时石西民布置我们写批乾嘉学派的文章。华东师大的历史系主任吴泽不知道来头，就在上海历史学会上反对批乾嘉学派。朱永嘉和朱维铮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朱永嘉在会上不声不响，朱维铮就埋头将吴泽说的话记下来。回到内刊后，沈竹来我们组，我们就对他说了这番情况。沈竹就让整理出来，发在宣传部的简报上。吴泽因此挨批评，倒霉了，所以对我们恨透了。其实这件事他是撞在枪口上了，我们这时是在丁香花园华东局内刊写文章，不是以前在学校里了，背景不一样了。之前我自己搞过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看《大清实录》，一册册翻，进行统计，发现文字狱在康、雍两朝还不算厉害，在乾隆年间发展到高峰，乾隆三十九年后文网越来越严密。批乾嘉学派时，金冲及看了我之前写文字狱的文章，让我把这一部分作为批乾嘉学派文章的开头直接放了进去。

戚本禹的文章出来后就是批李秀成，我写了一篇文章《大节、气节、晚节》。周原冰喜欢下围棋，吃过午饭后总要找我去下棋，不过下棋之前要先问一下工作情况，我就向他汇报说，我在写《大节、气节、晚节》，其实这个题目还是汇报中周原冰提出的。周原冰下棋是野路子，我是受过半专业训练的，是复旦的围棋校队队员，也是象棋的校队队员。下棋时，我一般在三局里胜他两局，让他赢一局，使他既有兴趣，也知道我的实力，如果全让他，会被他看不起的。我写文章“拎辫子”是跟周原冰学的，后来批周谷城时，我将材料讲给他听，他听完后一讲，就能“拎”到政治的高度上，我当时觉得很吃惊、很新奇。《大节、气节、晚节》这篇文章我写出初稿后，朱维铮改了二稿。他喜欢六朝文章，骈体文，把我的初稿都改成了成对成双的句子。我看到后很生气，那时气量小，回家的路上，在电车上气得昏倒。金冲及知道我的脾气，但也没点穿，就自己来定稿，把骈体文格式又改回原来的样子。石西民看了这篇文章后很满意，他对金冲及说，这篇文章可以算一篇小品文。我听了传达后还不高兴，怎么就是小品文啊。钦本立听说之后，对我说石书记的评价是很高的。后来上海市评三篇优秀文章，一篇就是《大节、气节、晚节》，还有一篇是沈竹、纪树立写的批合二为一的。三篇文章内刊

占了两篇。

金冲及当时提出拿到的稿费要交公，就交复旦大学，但复旦不肯收。后来我们就交一半，另一半我们拿去买香烟、茶叶。内刊里很多人抽烟，朱维铮、金冲及、我都抽烟，但金冲及和我抽得不多。当时我们历史组平均十天发一篇文章，大都发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笔名主要用的是“罗思鼎”，就是做小小螺丝钉的意思。我们写文章，一般初稿由朱永嘉、朱维铮和我写得有些，二稿一般是吴瑞武，定稿金冲及多些。但也常常大家一起定稿，将文章摊在沙发上，一起调整段落。

## 二

批乾嘉学派、李秀成等告一段落后，1965年初石西民要被调到北京文化部去，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也要被调到文化部去。石西民走时从上海带走了四个人，他的秘书小童、沈竹、金冲及和党校姓雷的一个人。金冲及走后，内刊编辑部希望朱永嘉和吴瑞武留下来充实编辑部。当时“罗思鼎”的名气已经响了，复旦党委希望我们快点回校去，杨西光不高兴他手下的人被抽调走，朱永嘉、吴瑞武和我都算是复旦的重点教师（全校有一百多个人）。而这时为了备战，丁香花园有现成的地道，就让整个内刊编辑部从丁香花园里搬到宛平路靠淮海路的一个大院子去（文革时期是专案办所在地）。石西民走时说，国内的“批修”交给张春桥管，国外的“批修”交给夏征农管，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没有怎么管过，这之后内刊就渐渐衰落了。一般说来，石西民温和些，张春桥辣豁些。

内刊搬出丁香花园后，我们随写作班搬到武康路18号。这里原来是一个姓白的部长的住宅，他搬走后我们进去了。隔壁是市委书记王一平的住宅，我们经常看到他孙女在院子里复习功课。18号里只有历史组和文学组，其他组都解散了，因为石西民对经济组、哲学组不太满意，主要是文章写不好。这时文学组人不多，只有戴厚英、吴立昌、陈冀德等五六人。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第四稿就是在武康路18号完成的。但文章是在丁香花园开始写的。那时姚文元来找历史组说要搞明史，历史组负责的是朱永嘉，就陪他一起去上海图书馆找了葛正慧，葛对资料十分熟悉。在武康路18号时，姚文元一个星期来两次。徐景贤就是与内刊脱钩后来武康路18号担任写作班支部书记的，郭仁杰任副书记，但郭不常来。这段时间我们常去看现代戏，是徐景贤从宣传部拿来的票子，如《自有后来人》等。我第一次看到江青就是在剧场里，那天红线女演《三湘风云》，江青走进来时，文学组的人就指给我看。

在武康路18号时，姚文元对我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集出了一大堆，开集会，有许多宣传。1961年也是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却冷冷清清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我还真是从来没想过，所以怎么抓辫子我又是向姚文元学的。而将文章与政治联系起来是周原冰教我的。所以我学会写政治性文章是受过很多人敲打的。

还在丁香花园时，学校里就要求我开一门近代史的课，每周一次。我每个星期早起坐车回学校一次，上午四节课，下午搞一些辅导，晚上回到丁香花园。金冲及去北京后，他将他讲过的三次讲稿都给了我，实际上是将我看成他的接班人。我就将他三次讲稿合起来，重新写成一份讲稿。当时胡乔木讲过一次《文章做法六十条》，我们在丁香花园搞到这篇讲稿的记录稿。后来复旦要教写作，我就根据这一讲稿去教写作。胡乔木是会写文章的，所以讲稿不死板，实际上我课上说的话几乎都是和胡乔木学的，学生听了很是欢迎。

## 三

在武康路18号的时间不长，过了一段时间，1965年夏天我们回复旦到崇明去搞四清了。我记得我们是改完高考考卷去四清的，去的是横沙岛新联大队。朱永嘉是新联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我当秘书。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大队，那时候我记性好，要到公社去汇报，不用笔记本，全靠脑子记，数字都能背出来。

在崇明参加四清三个月，11月我们回上海了。朱永嘉先回去的，随后我、吴瑞武和朱维铮也都回上海了。

我们回上海大概是在11月16日，那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我们回来就到了武康路2号，就住在那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当时我已成家了。

在武康路2号，姚文元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房间对面，隔着一个走道，他单独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在那里休息，但不住在武康路。这时我与他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在丁香花园时，我与姚文元并不熟悉，因为他不住在那里。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写信威胁他，组织上就将他安排到康平路100弄华东局处以上干部居住区。在武康路2号时，他写文章要找资料，常常会到我们办公室来聊聊。我们那间房间，靠窗两个是朱永嘉和吴瑞武，靠里面是朱维铮和我。姚文元来就坐在我的旁边。那时我有个习惯，喜欢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糨糊粘一下做成一个新的信封，姚文元经常来拿我做好的信封寄信。武康路2号学习是在底层的大厅里，姚文元也一起参加的。

姚文元这个人生活不讲究，不拘小节。我和朱永嘉对生活也很马虎，我们三个人是同气相求的。他常骑着自行车从延安西路33号到武康路来，在普通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菜是很一般的。那时我犯胃溃疡，家里带了一点米自己烧粥吃。他喜欢吃粥，就过来一起舀点粥吃，午饭就对付过去了。他穿着很随便，就穿一双布鞋，天冷的时候一件立领的棉袄是旧的，袖口也是破的。他不喜欢多说话，但与我说话还是蛮多的。我喜欢看科普文章和科普小说，姚文元也喜欢，所以兴趣接近。

有一次我对他说，威尔斯有一本《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我没看过。姚文元说他有，就借给我看。朱维铮也喜欢科幻小说，看到后就问我借了去，后来他带回家，给他太太看了，他太太也喜欢科幻小说。姚文元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这本书宣扬迷信和唯心主义，强调头脑决定一切，跟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不一致，内部看看就算了，怎么可以给家里人看。所以姚文元对朱维铮印象不太好。姚文元阶级警惕性很高，一直抓别人“辫子”，所以对自己要求也很高，蛮顶真的。有一次天冷时，朱维铮、朱永嘉都回家了，姚文元到我们房间来，因为我们房间有一只火炉，他过来烤火，就与我两个人聊起来，讲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本来是卢湾区宣传部的，后来作为工作人员而不是作家进了作协。1957年在《文汇报》写的《录此备考》的文章被毛主席看上，就此起来，后来文章就渐渐写得多了。他对柯庆施印象很好，因为柯庆施一直支持他。他对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印象不好，因为陈压他，不让出版他的《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这本书。（陈冀德在她那本书中也说，她在作协时陈其五让他们调查姚文元的文章，可见陈其五对姚文元是有看法的，压制他的。）但姚文元说，有毛主席支持，是压不住的。

姚文元也谈了对我们几个人的看法，但他没有谈朱永嘉，因为朱是我们的头。他说：吴瑞武比较稳当，但是过于平稳，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四平八稳的，缺少新的见解。朱维铮有点浮躁。又说我最大的毛病是士为知己者死。这讲的是对的，因为我从小武侠小说看得太多，很讲江湖义气。我那时对姚文元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我的指路人，是他教会我怎么写政治文章的。我那时就是向比我水平高的人学习。姚文元还告诉过我，批《海瑞罢官》和批“三家村”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写威胁信给他，所以他说写文章有时也要以付出生命做代价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武康路2号就热闹了，成了一个中心，那里本来是没有什人来的。以前在丁香花园时，有很多人来，但都是头头与头头碰头，因为有石西民，再后来有周原冰他们，与我们接触的只是报社部主任一级的，如《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吕子都。但这时到武康路来找我们的人就不一样了，是《文汇报》的总编辑陈虞孙，《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马达。马达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没多久就过年了，马达来到武康路2号，穿着中式棉袄，双手一拱，向大家拜年，说我现在《解放日报》手里只有十篇文章，你们要大力支援。因为那时我们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投给《文汇报》的。

姚文元文章出来后，《文汇报》发动大家讨论，叫大家来鸣放，陈虞孙讲要制造对立面。我听朱永嘉、姚文元他们讲这是张春桥的意见。结果一共有四个人上钩。一个是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周子同。他的文章给了一千字十五元的稿费，当时稿费一般只有六元，高一点的给十元。还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林丙义，当时在中学教书。林丙义的文章登出来后，我想，糟糕了，他要倒霉了，但我也没办法跟他通气。还有两个上钩的人我记不得了。

批《海瑞罢官》后，我们历史组除了自己写文章外，还搞了关于清官和让步政策的讨论。让步政策是翦伯赞主张的，我们的老师陈守实说，这是因为王朝开始时人口少，统治阶级胃口就小了，以后人口一点点多起来，胃口就一点点扩大了。西安的孙达人写过一篇批“让步政策”的文章，毛主席看到后很赞赏，张春桥也晓得了，就将他从陕西调到上海我们历史组，就坐在我们办公室里。孙达人第一篇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但来到历史组后写不出什么新东西，后来看看不行，就又将他调回去了。

至于清官的讨论，我记得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过很长的文章，他用的笔名是方求。当时每星期三要学习讨论一次，我在讨论中兴之所至地说，清官实际上就是割蚯蚓喂鸡，割一段喂一段，蚯蚓割了还会长出来，死得比较慢一点，贪官就是一记头吃掉。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姚文元也笑了，说这个倒是妙论。后来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给《解放日报》。编辑是石西民的弟弟石成岳，他读了很感兴趣，说要发这篇文章，但又说蚯蚓不是喂鸡，是喂鸭的，我说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写好后，我请姚文元看，让他帮我改一改。姚文元帮我改了，他在文章的开头加上一句：“地主与农民，到底是啥人养活啥人？”我当时觉得蛮吃惊的，不大能接受，认为学术讨论文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大白话写进文章啊？太口语化了。但这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认识到写杂文可以不拘一格，可以写得很通俗。

#### 四

姚文元自己这时写了篇批李平心的文章《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登在《文汇报》上，用的笔名是“伍丁”。他跟我们讲，伍丁就是五个人。因为当时历史组是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四个人，加上他就是五个人。其实伍丁只是姚文元个人的笔名，我们“罗思鼎”小组从来没用过。实际是不敢用，这是领导对我们客气，我们不敢当福气。他用这个笔名表明他自认与历史组是一体的，其实他本来是属于文艺组的，但那个时候他主要写与历史相关的文章。姚文元为什么要去批李平心呢？当时报纸上都登毛主席语录，《文汇情况》增刊（《文汇情况》我们历史组有，但《文汇情况》增刊印得少，我们没有，姚有一份）上有文章说李平心把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放在厕所里面当大便纸用。当时毛主席是啥威信啊？把毛主席语录用来擦屁股还了得，所以姚文元看了气得不得了，要写文章批判。但这样的事情又不好写出来，所以他就写文章批李平心，这就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这篇文章的起因。我当时也搞不懂，李平心就算思想反动顽固，他胃口有这么好，那报纸上是有油墨的呀，擦屁股不要弄脏了？但增刊上就是这样写的，也不知道这记者是怎么发现的。姚的文章讲了东林党的事情，我们呼应姚文元也写了东林党的文章，是朱维铮写的，用“罗思鼎”的笔名登在《文汇报》上。

当时我们也要写批现代的让步政策的文章，揭露蒋介石在江西从未执行过让步政策，这就从复旦历史系调了黄美真来。他是1965年底1966年初来的，在武康路待的时间不长。稍后又从复旦调了两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在后来在《文汇报》工作的施宣圆。黄美真（或者是吴瑞武）带这两个研究生到江西去搞调查。他们回来后讲，蒋介石占领苏区后，石头要过火，人要过刀，杀了很大一批人，因此是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可言的。他们也讲了红军的故事，说彭德怀误杀了王佐、袁文才。他们在江西还调查了蒋经国抗战时期在赣南的情况，于是我们就写了批蒋经国的文章，题目是《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清官》。这篇文章是大家一起写的，很长。文章写好后，已经是1966年的五六月份了，正好周总理到上海来，就送给总理看，总理说暂不适宜登，文章就被扣压下来了。我想总理可能是考虑统战问题吧。

在武康路2号的时候，有一个科委派出的小组，是科委副主任李宝恒负责的，白天在武康路办公，晚上不住那里。但这个组叫什么名称我讲不出来。这个组有十几个人，纪树立当时在这个组，还有徐福生，他是上海师院毕业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过上海出版局局长。徐福生跟于光远到东北大庆去考察过，回来后给我们大家介绍过大庆。这个组还有一个姓徐的大个子，一个很高大的人，文革初期曾和工总司在一起，做过王洪文的保镖。组里还有一个复旦物理系来的姓潘的。我没有看到这个组发表过什么文章。

在武康路2号时还有一个哲学组，组长是郭仁杰，他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到华东政法学

院当教研室主任，对这样的调动他很不满意，以后就到市党校找了程绮华、谢宗范组成了哲学组，但平时三人基本上是不往来的。与我们经常接触的是文学组，彼此很熟悉。文学组当时有刘景清、吴立昌、陈冀德、戴厚英等人。戴厚英不像在丁香花园时，来得不多，好像回作协去了。文学组这时写批周扬的文章，这是陈丕显布置的。徐景贤叫我去关心他们的文章。我想徐景贤是领导，叫我做我总归要做的。文学组认为批周扬资料不足。当时写作班里有十九种影印刊物，如《向导》、《解放日报》（延安版），但没有人看。这些影印期刊我在复旦的时候看过。我就去问他们，你们好像不会用材料，为什么不去看这些影印期刊，《解放日报》上有周扬的文章啊。我记不清当时是动手改还是嘴巴讲，只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因为是徐景贤叫我去帮他们的。假如是现在，我绝对不去做了。我是历史组的人，又不是头，连党小组组长也不是，叫我去关心文学组，这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他们肯定会不开心的。但当时我只知道服从命令，因为我是部队里出来的。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蠢啊。

不久《二月提纲》出来了，写作组闷了一阵子。我记得写作组学习会讨论时，姚文元说，有时候宁可不写文章，不写比写好。实际上他是对《二月提纲》不满，但没有讲出来。张春桥这时到苏州去了，写作组没有上头领导，断线了，就靠徐景贤在宣传部获得点消息。不久张春桥回来了，就说要搞“三家村”。我记得那一天陈虞孙来了。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说写《海瑞罢官》的底与彭德怀翻案是有关的。他一讲高兴起来，就立在凳子上，我看了蛮担心的，毕竟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是小青年了。陈虞孙接着说接下来就是要批“三家村”。

准备批“三家村”的文章时，姚文元叫我协助他搞资料，我就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借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送给姚看。姚看后在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画杠杠，然后姚文元叫我送到市委宣传部，要蓝瑛批示送市委印刷厂去排印，蓝瑛是市委宣传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负责办公室事务。蓝瑛批了以后就送交印刷厂，结果印了六十套。这件事市委是知道的。姚还让我摘编有关“三家村”的资料，我摘录了就交给他做参考。姚文元平时就在我们的对面房间写文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写，除了市委要讨论，他不喜欢大家一起讨论。他自己的讲话稿都是他自己写的，不喜欢叫别人写，后来《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也是他自己写的。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写好后直接送上海市委。杨西光看了后觉得有些话太凶了，就建议删掉五个耳朵，就是五个问号。后来戚本禹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到上海来，见了姚文元，讲起这桩事情。戚本禹说，你把这五个耳朵给我吧，姚文元同意了，说随你处理吧。这是姚文元自己告诉我的。所以戚本禹的文章中有这五个问号。

《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登在1966年5月10日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文章放在第一版下半部，上半部发表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记得姚文元当时到历史组来，说：好消息！好消息！随即拿出一块云南沱茶和一包糖果请我们吃，表示庆祝之意。实际上他这句话是有双关意思在内的。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委为配合批“三家村”，要我们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摘出来编成材料，再加上评语送到市委。一天，市委叫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到市委书记处康平路小礼堂三楼看样稿。这是我第一次进康平路。吴云溥（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主任）与大家共同推敲，商榷词句。那天晚上与市长曹荻秋面对面接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所以印象深刻。他来后开口就问：搞得怎么样了？男客人、女客人要看。我搞不清楚男客人、女客人是谁，就问市委办公厅的吴云溥，他说男客人就是毛主席，女客人就是江青。后来这批材料像批胡风材料一样登在《解放日报》上。

这批材料登出来后，胡乔木在杭州对姚文元提出了意见，说有一个材料搞错了，时间不对。杨西光就把我们找到康平路小礼堂，问我们怎么办。我印象很深，小礼堂拉了两层窗帘，我们大家七嘴八舌的，有的说改，有的说不改，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杨西光说不改了不改了，毛主席已经看过了，一个字都不改，不去理它。胡乔木如此关心这件事，想来是因为他在195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海瑞精神的文章，尽管他也是根据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话而写的，与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一个道理，但他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心里不自在，所以抓住问题就向上海问责了。

这时候历史组非常风光，经常接触市委书记杨西光，而张春桥因为帮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不常在上

海。杨西光对我们的事很起劲，所以我们写作组与在丁香花园时不一样，那时是大组织里的一个部门，不是独立挑梁的，现在是独立挑大梁了，接触的都是报纸总编辑这一档人，人家对我们很重视，当一回事。这是写作组的“一起”，写作组一共是“三起三落”。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  
【文革一页】

我的武斗经历

• 丁学良 •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

◇ “少将”碰上“小将”

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安徽的淮南、安庆和芜湖等战略要地的局势日趋严峻，本省的驻军变得不管用之际，毛泽东亲自下令原来驻扎在江苏北部的野战部队第十二军，于1967年下半年开进安徽，实行军事管制，以图阻止武斗大火越烧越烈。

这十二军刚一开进安徽，本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间就流传：十二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平平，虽然也上过甘岭，却没有打过什么特别有名的硬仗，云云。这很可能是谣言，但没有人去核实，倒听信了它；所以对这支奉钦命入皖收拾乱局的部队，大家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敬意。当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他是1955年解放军第一批授军衔时被封为“少将”的——召集武斗两大派的头头谈判停火时，红卫兵小将们斜着眼睛瞪他：“你算老几，让我们放下枪杆子？你不过是个少将，比我们小将只多把指挥刀。”——意思是“少”字下的那一撇。

可就是这位李德生，却立刻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天赋。时至1968年年中的他，也有五十岁出头了，为着劝说芜湖市鏖战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别再把武斗升级了，他竟然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标准行头，不戴钢盔、不携警卫、不佩手枪，只身攀登云梯，爬上三、四层高的武斗据点大楼，从架着机关枪的窗口钻进去。

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他爬云梯的时候，两派还在隔着大街对打，步枪、机关枪点射连射没停过。他这么一招，还真管用！红卫兵们认他是条硬汉子，就服了他，把大街上的武斗据点给撤了。

李德生一身红军打扮只身入虎穴做红卫兵思想工作的作为被毛泽东知道了，大为赏识，称他是“政治将军”，有头脑。一年多后，就破格提拔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乃上将或大将级别的要职），1973年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步登了天。所以我们红卫兵小将说他是“先登云梯后登天”。

◇ 围城

我本人在红卫兵武斗中的表现，似乎还比不上安徽省在全国武斗中的表现，排列不到中上游。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又戴着副近视眼镜，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被编进“武卫队”，而是在“文攻队”里任一员干将。

但是我不甘心于远离硝烟的文攻生活，只要哪里有大的武力冲突，我都会插上一脚；从文革开始直到结束，



都跟有惊有险的日子沾着点儿边。第一次的大危险，算是1967年的“一·一四事件”。

那年的一月中旬，位于安徽佛教圣地九华山脚下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告急：他们被几万农民包围了；数日之内，会断粮、断水、断医药、断通讯。

农民进城包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文革早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典型方式。按照中共“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从省到地市到县到人民公社，各级政权党委会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该层级地方武装力量的“第一政委”。“地方武装力量”在省和地市层级上是“军区”和“军分区”，统管地方驻军。到了县和人民公社层级上，就成了“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主要管民兵组织。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的党委书记们，级别高的，就往省军区和地市军分区里面躲——那里是“军事要地”，门口有大兵荷枪站岗，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一开始还不敢朝里面横冲抓人（过了一阵子咱们就敢了，这是后话）。级别低一些的，就往县人武部里躲。县人武部通常只有一个小院子，躲在里面容易被外面的人看见，也憋得慌。胆子特别大的县委书记们不甘心被捉去游街示众，甚至会下令调遣四乡八镇的民兵，进城护驾。

青阳县城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县人武部通过遍布乡镇的民兵系统一声令下，说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学生策划绑架了县委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要挺身而出粉碎右派翻天！”并且许诺——这是最打动农民的——进城来护驾的农民，管吃管喝还补贴工分（“工分”是农民下地干活的计时报酬）。这样的美差谁不要参加？于是一昼夜之间，漫山遍野都涌出成群结队的农民，把个青阳县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率领农民大军围城的一位人武部副部长发出豪言壮语：“这下子进城抓造反派学生，跟进裤裆抓鸡鸡没两样，手到擒拿！”

#### ◇ 驰援

围城的民兵和农民们尚未携带正规的军械，那时候的武斗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却配备着一样利器——上等树杆经烟熏矫正、笔直成线、两端镶着铁头尖刺的扁担。在我们安徽乡间，普通农民的扁担是毛竹做成的，力气过人的农民的扁担才是树杆制作的，能挑三、四百斤不开裂。青阳深山里的农民的扁担又高了一等，属于“奇门农具”：它的两端包镶铁尖，有六、七寸长，平时上山砍柴，不管是成捆的茅草还是成捆的木柴，只要扁担铁尖朝里一戳，一头一捆，担起来就走，干净利落。青阳的山民们多半会几手武艺，一杆铁尖扁担挥舞起来，四五个壮汉近不得身。

我们宣城的援兵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加上普通职员和市民，约有两千人，征得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上了路。过了一个多小时，就与其他县市来的增援车队在途中会师。快到青阳县境的时候，已经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数百辆大卡车连接成蜿蜒几十里的长龙，发出低沉的撼地的马达声，飞扬的尘烟直冲云霄。

渐渐地，我们前头部队到达距青阳县城只有几里路的要道口。我们这几辆车属于指挥、协调、宣传众核心小组的，配备有当时能够合法非法弄到的最好的步话机、无线电发报机、小型发电机、播音系统和医疗急救设备。这时已经暮色浓重，四周的山地黑黝黝的，并不见围城的农民们在入城的要道口设障阻挡。我们估计，十有八九是这帮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们被汽车长阵给吓跑了——数百辆大卡车的灯光这时在曲折的山道上连成串串火龙，首尾呼应，气势慑人。

指挥车发出命令：全体车队马上进城，尽快与被围困的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会合，协调下一步的联合行动步骤。这一天便是“一·一四事件”的前奏——1967年1月13日。

若干年以后我才注意到，那一天是星期五。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三号碰上星期五，预示着不是好事。

#### ◇ 被围

一路颠簸赶来声援的外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随便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学校教室、公共澡堂、旅店客栈、机关单位、国营商店、医院诊所，倒头便睡。我们宣传组的一小群人，却必须守在卡车里，连夜赶编赶印赶发革命传单。忙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值夜班的人神色紧张地小跑过来，报告我们旁边那辆负责通讯协调的卡车上的人说：进城出城的交通要道路面统统被挖断，城周边树林里有多处篝火，人影幢幢，号角声依稀可辨。

天色越接近明亮，情况越接近明朗。等到冬日早晨的阳光把这个小山城唤醒以后，咱这一方就全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从各县市赶来声援被围困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时候，青阳县委、县人武部也在加紧组织更多的民兵和农民赶来增援围城的人马。头一天傍晚我们在入城要道口那里嘲笑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被汽车长阵吓跑了的当儿，他们的指挥官和民兵营长、连长们在嘲笑我们这群外地飞来的傻鸟“光着头钻刺窝”——路口上原来封城的民兵岗哨撤走是为了“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等到我们的车队开进城里，他们就趁着夜色的遮蔽，把四面八方能行驶车辆的道路全给挖开了。

我们连夜赶编赶印的传单上，把自己一方的“滚滚铁骑”（汽车大队）载来的援兵赞为“飞将军自重霄入”——那是借用毛泽东 1931 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的名句。在传单的结尾处套红印着这首词的下半阙三行：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的传单散发出去没两个时辰，对方的传单就撒进城里来了。那上面也套红印着毛泽东的一首词，也是作于 1931 年夏，也是用的《渔家傲》词牌，不过是《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他们把我们比作 1930 年 12 月底在江西龙岗大战中被红军活捉的“敌军师长”张辉瓒；张是蒋介石派去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前敌总指挥”。

#### ◇ 觅食

青阳县城里的我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虎。小小的山城里，顿然增添数千名生猛人口，原本就缺粮的状况立时变成燃眉之急。我们来的时候也随身带了一点干粮，两三顿下来，也就基本上给报销了。那个年头的我们，除了粗菜糙粮以外，肠胃里进不了多少油水，肚子的容量也就特别可观。我们常表示，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一次军官授衔，咱们都别争高低，一律要求被封为“大尉”（大胃）得了。

到了 1 月 14 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满青阳县城里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我们的车，能走路的地方都拥挤着我们的人。所有这些窜来窜去的人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找吃的。我们到处乱窜觅食，找的并不是寥寥无几、空空如也的饭馆餐厅，而是“副食品商店”——所有那些卖糕点、零食、豆制品、瓜果和南北干货的杂货店。

我幸运地在一间后街窄巷的小店铺里买到两只麻饼，巴掌大小，约莫半寸厚，加起来七、八两重。这两只令很多人眼红的麻饼，没有亲密战友卢扁的通风报信，我靠自力更生是断然找不着的。在临近街面的所有店铺

都已经被半饥饿的造反派战士几番寻觅以后，精明的卢扁决定不再白费力气在老地方周旋。他让本地的两个小男孩领着他找副食品商店，许诺——这是他从青阳县委、县人武部动员农民围城法中现买现卖学来的——只要找到了有吃食出卖的店铺，就给他们每人买一根棒棒糖。那两个男孩没命地领着卢扁奔后街穿小巷挨店挨铺地搜索，终于找到了一家还有少许麻饼和董糖（通称“酥糖”）的小店。卢扁掏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钞票和粮票——那年头买食品只有钞票是不成的，还得有粮票；我们城镇户口的中学生，每人每月21斤（市斤）粮票——买了六只大麻饼。我跟踪而去，买了两只，那是我力所能及的大手笔。

#### ◇ 绝食

当城里能找到的吃食急速减少的同时，城里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消息却急速增加。有人告诉我们，围城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民兵干部们暗地里带了手枪和手榴弹。又有人告诉我们，城里已经潜进对方的奸细数十名，分布于要害地段，以作里外策应。

围城大军迟迟没有攻进城来，主要原因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等几个党政要员被扣押在青阳县红卫兵的手里。红卫兵们十分清楚，这几个县党政头头，是策动民兵和农民围城的幕后黑手。围城农民大军的指挥部早就放话：“你们只要放了县委领导，我们就散伙回村，抓革命促生产。”青阳县红卫兵嗤之以鼻：“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孙大圣，火眼金睛早就看穿了你们的诡计！你们先撤兵，咱们再坐下来谈判。”

于是就形成了眼下的僵局：围城大军不敢立刻攻进城来，生怕红卫兵急迫之下伤害他们手中的人质，尽管那时候大家还不习惯用“人质”的说法。红卫兵也不敢突围冲出城去，对方的力量太大，成千上万枝铁尖扁担结成的阵势，谅你冲出去几步也跑不远，就给生擒活捉。

围城指挥部的战术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们要把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围困到饿得打不了架、乏得跑不动路的地步，方才大举入城，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个活捉我方大小头目。

面对这样的局势，青阳县城和外地增援的红卫兵造反派联席会议当即决定：从1月14日下午六时起全体绝食。

这个决定十分及时，反正城里剩下来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与其被生生饿垮，不如把饥饿当作政治武器，与对方摊牌较量。

#### ◇ 虚脱和解脱

绝食指挥大本营便设在青阳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那几个走资派便扣押在院内的办公楼里。我们的汽车停在院子门外两排，院子门内两排，为的是保护指挥大本营。指挥组、通讯组、宣传组的专用车和小组工作人员当然也在这个核心圈子里。

绝食斗争的中心是县委大院里的那一块场地，别处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可以在他们寄宿的室内绝食，而大院里的那块场地是露天的。时值1月中旬，夕阳西下之后绝食发起之时，室外气温降到只有摄氏三、四度。

报名参加室外绝食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约有300多人，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圈，每个圈圈的外围是男战士，内圈是女战士。天黑以后，我们升起了篝火，柴薪便是县委办公楼里的桌椅板凳衣柜书架。我们将家具拖出来，砸碎点燃，边砸边大呼“不破不立！”这青阳山区盛产上好木材，家具耐烧，并且散发出郁烈香气。

这一夜的绝食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先倒下去两位体弱者，均是女性。她俩头晕不支，渐而眼前出现幻觉，抬去医院，也没有葡萄糖生理盐水。找来一点红糖泡开水给她们喝，她俩坚辞不受，宁愿绝食牺

牲也不肯中途易弦滋补糖水。

大清早趁着少数当地人出城，我方混杂在其中几名探子，去刺探围城大军的动静，不幸半数被抓获。围城的民兵指挥部捎过话来：如果我们在城里伤害了他们一派的战友，他们就把我们的探子点天灯。“点天灯”是山民们惩罚土匪毛贼的传统方式：把人剥光以后吊在树梢上，下面堆放松油树枝，点燃以后，将人活活烧死。人被烧烤时油脂滴下来，勾引松油树枝的火焰上蹿；远远望去，像是一盏特大的豆油灯。

1月15日的中午，又倒下去几个绝食者。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天上忽飘下雪片，支撑不住、虚脱晕倒的已达30多人。原本绝食战士还间或吟唱《毛主席语录歌》，到了这当儿，就哼不出声来了。我们宣传组的几个人靠在卡车的轮胎上，坐守着文攻的器材纸张。放眼四周，县委大院里一片白茫茫；飞舞的雪花下，暗红的篝火衬托出黑黝黝的团团人影，互相紧紧倚靠着，偶尔会发出衰弱的咳嗽声。

医院和诊所那边非常担忧，照这样下去，虚脱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又没有必需的药品，体质差的怕难保性命。那个年头的中国人民少有营养健全的，一顿不吃，就顶不住；一天两夜不进食，哪能抵挡得了冬季的寒冷，急性肺炎之类是难免的。

绝食指挥大本营一面命令把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们从生着炭火的里屋拖出来，搁在露天的阳台上晾着，让他们亲眼目睹绝食场面；一面加紧把青阳县城里的局势向安庆、芜湖、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告急。拍出去的电报一份比一份悲壮，一份比一份更撞击人心：

“青阳城里风雪交加，革命造反派战士已绝食一昼夜！”

“露天雪地里，数十名战友绝食晕倒！”

“十万火急，夜间气温零下五度，百多名绝食战友奄奄一息！”

“青阳走资派的反革命阴谋即将实现，上千名红卫兵造反派就要被饥寒夺去生命！”

这些骇人的电报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些与我们同属一大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中像雪球一样滚动着，越滚越大，越滚越猛，最终向着同一个目的地——首都北京滚去。

与此同时，对青阳县头几号走资派的再教育正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从温暖的屋里霎时被拖到露天阳台上，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们即便是裹在厚重的棉军大衣里，也禁不住鼻涕直淌。不多时，挂在短须上的鼻涕就变成了小型冰激凌一样介乎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东西。在是不是应该给这几个走资派饭吃的问题上，红卫兵小将中间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一些人认为不给他们饭吃便违反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规定的“不虐待俘虏”一项。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投降，怎么可以算作“俘虏”？这几个家伙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主席早就教导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在一开始的时候，前一种主张占着上风，红卫兵小将甚至给走资派的阳春面里放进青葱和酱油，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绝食战友衰竭倒地之后，第二种主张便大得人心。几个走资派被迫参加了我方的绝食，这些在1959—1961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期间也没少吃一口的人民公仆，终于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首次尝到饿饭的滋味。断了他们一顿晚饭，便涕泪横流地哀号，说在阳台上熬不住了，恳求小将们让他们进里屋去继续陪着挨饿。押送他们的几个小将恶狠狠地指着阳台下面的青石板正告他们：“我们绝食饿死前的最后一口气是专留给你们的——把你们头朝下推下去”！

像雪片一般飞向北京的加急电报，经由安徽省革命造反派驻京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的传递，终于呈报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里。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口述了《四点处理意见》：指示青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立即调送食品和药品给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全力抢救生命垂危的绝食人员；指示它们立即解散围城的民兵和农民；指示青阳红卫兵造反派马上释放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干部；指示外地来声援的红卫兵造反派马上返回原地闹革命。

中央文革的《四点处理意见》堪称老到，打了我们三十大板，却打了青阳县党政头头们七十大板。可是这份及时雨般的急电却欲送无门：县邮电局的职工已不知去向，铁将军守大门；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里的机要秘书室也没有人在值班，门上贴着封条。我们随车携带的收发报机是私自设置的，严格说起来属于“非法电台”，北京当然不会朝它发送电报。中央文革最后把电报发至临近青阳的一座军用战备电台，指令部队向涉事的各方转交。

青阳城附近的军用电台用吉普车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给我们送来中央文革的指示；当我方的男女广播员用激动颤抖的语调念出自首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全场绝食人员——包括那几位被迫陪同绝食的走资派——都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和咱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和咱们亲又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只不过被打了七十大板的他们，喊得不如我们激情充沛。

为着让城内城外各帮各派都能尽快落实中央文革的英明指示，所有的广播车和喇叭站都开足马力，不休止地宣读《四点处理意见》；一切可以找到的油印器材，也都连夜运转起来，印刷传单，星夜散发。到了天明之际，拥护《四点处理意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小小县城的大街小巷。时至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城外的民兵和农民大军失去了踪影，我们同时也领到了急救的食物。那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吃到咸味饼干，南京制造的。

1月16日下午，我们的车队得胜归朝，返回宣城。可怜的母亲看到我满脸青灰色，猜到我们这几天吃了不少苦头，泡了一碗珍贵的红糖开水——那年头城里人每户每月只配备四两（二百克）红糖——让我喝下。吞下一海碗阳春面，我心满意足地便去城北门的澡堂子泡澡，清洗满身的征尘。

半小时以后，我晕倒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被好心的同浴者架着出来；他们挺纳闷，这么小小的年纪，怎么像老年人一样“晕澡”？我像一只断了筋骨的大爬虫，在躺椅上光着屁股盖着毛巾养息了两个时辰，才爬起来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再过一会儿，澡堂子就要关门了。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

【当事者言】

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上）

• 程汝明 •

程汝明 口述  
阎长贵 李宇锋 整理

程汝明 1926年生，2012年因病去世。1954年开始在毛泽东专列上做厨师，1956年调任毛泽东专职厨师，1961—1976年10月任江青专职厨师。

◇ 李讷说的“你们不要狗仗人势”这句话很简单，也不中听，但细细品味，含义十分深刻

郑仲兵（简称郑）：我也叫你程师傅吧。你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十几年，今天我们想请你谈谈关于江青的一些事情。

程汝明（简称程）：好。从哪里说起呢？今天阎秘书（整理者按：指阎长贵）、杨秘书（整理者按：指杨银禄）在，我就从他们说起吧。我想他们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阎秘书走的时候我挺难过的，我真不知道他走。阎秘书被江青赶走（整理者按：指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多）了，那天李仁庆值班，他说起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们聊起来就说，他完全是无辜的。杨银禄、周金铭走（整理者按：周金铭曾任江青警卫员，他们被江青诬为“反革命”，要总理抓他们，他们受到总理和毛主席的保护，去了五七干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就小李子（整理者按：指看门、搞卫生的李执清）在楼门口警卫值班，说杨秘书被汪主任叫走了。当时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挑选的时候，都是左挑右挑，都是德才兼备表现最好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点儿缺陷和毛病都绝对进不来的。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是被人们公认的好同志。有件事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办公厅就“四人帮”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现问题，专门派人到钓鱼台国宾馆向领导和群众进行了解，问哪个楼里的工作人员最好？普遍认为十楼（整理者按：江青住的楼）的工作人员最好。说他们作风正派，谦虚谨慎，不盛气凌人，办事规规矩矩。怎么说呢？我们确实没有什么邪的歪的。对有的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挺大，对我们这儿没这种反映。我们对江青既不打她的什么旗号，也不占她的什么便宜。李讷在我们面前常说：“你们不要狗仗人势！”她这句话对我们刺激挺大，教育挺深。这完全是胡说，我们谁也没这样。不过她这样说，虽然听着逆耳，但也能鞭策我们老老实实做人。

郑：李讷还说过这样的话？

程：是啊，她常说这句话。当时的李讷，真不喜欢那一套，包括江青，她也不喜欢。李讷病病歪歪，心情不好，和他妈的关系也不好。她和她妈一样，不断地折腾工作人员。我们都不跟她一样，看在主席的面上，对她还是尽量地体贴、照顾。

江青批评起工作人员来，不分时间和场合。1975年到大寨去，江青叫电影明星秦怡给她拍照，她也给秦怡拍照，她还给其他人拍，她还叫她身边的人去拍。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江青继续给人照相，江青身边这个工作人员又主动去照，江青就火了，声色俱厉地说：“我这是工作，你干什么？你这是抢镜头！”弄得这个工作人员下不来台。回来以后她跟我说这件事，我跟她说：“是啊，我说有些事儿她让你去你就去，避免着不去也可以。像你说的照相这件事，如果不是她讲话，最好别抢着往前去。”

杨银禄（简称杨）：我们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十多年，总结了两句话：一个是知道的越少越好，第二个是离得越远越好。比如，人家新华社摄影师一照相，一拍，你赶快离远一点儿，别往里挤，越远越好。

程：刚才杨秘书讲的这个，我很赞成，在很多情况下，就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把工作做好，你去就是组织上派你去，就是要求你把工作做好。而在江青身边怎么做好工作，可真不容易。

杨：受宠不要若惊，更不能若狂。她喜欢你时，即她高兴那会儿，她什么都跟你说，你可千万要注意，千万要警觉。你还是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能大意，否则就坏啦。

程：用过去咱们大老粗讲过的话来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你乍一听李讷说的“你们不要狗仗人势”这话很简单，也不中听，但把这句话细细品味起来，其含义十分深刻。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现在有些领导人的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耀武扬威，称王称霸，这就是“狗仗人势”，实在是一种低级趣味。我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既不仗着江青或打着她的旗号做什么事，也没沾过她什么光。

◇ “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不是中央办公厅的人啊”

阎长贵（简称阎）：跟江青大概没一个沾光的，倒霉的倒不少。

杨：倒大霉的就是老阎，倒中霉的是我，小周（整理者按：江青护士）霉倒得也不小。

程：实事求是地说，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沾光的。你看小周在江青身边吃了多少苦。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抓，我们工作人员进了花园村学习班暂时不能回家。小周很担心我老伴的身体状况，因我老伴几年前曾因病半身不遂。当时我家已搬离原来的地方，小周边打听边找，找到我家看望安慰我病中的老伴。

李宇锋（简称李）：工作人员都给抓起来了？

程：实际不算抓，进学习班软禁起来了，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还不准什么？反正有这几个“不准”。

杨：你在学习班呆了多长时间？

程：我在学习班一个多月，没等结束，我就提前出来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插曲。王自开是警卫局交通科的机动司机，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张春桥的司机家里有事，派王自开去替班，那是正常地替班，结果把他也弄走了，也进了花园村学习班，他在学习班有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向学习班领导提出来，说我是替班的司机，叫我老在里头呆着干什么？最后就让他回去了。当我在学习班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王自开能回去，我怎么不能回去啊？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我不是中央办公厅的人啊！

李：您是铁道部专运处的人？您的组织关系、档案一直没转过来？

程：没转过来，但是党的临时的关系在这边儿。

李：拿工资还是在铁道部拿？

杨：对，对，张玉凤（整理者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也是，他们是一个单位的。

程：我为什么在铁道部拿啊？铁道部的工资高，并且奖金多。这样我要调到中央办公厅以后，我一个月就亏好几十块钱哪！我的工资那时候是相当高的，99元，有副处级的那么高。

李：那您这个工资还加上几十块钱补助？

程：是啊，工资和其他补助加在一起，一个月最少也得150多块钱。

李：那您那时候比他们二位（整理者按：指阎长贵、杨银禄）都有钱。

程：那时候可能比他老头子（整理者按：指郑仲兵父亲）恐怕还拿的多。

杨：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那时候工资老程第一，我和大周第二，我们是70块钱。

程：最后我一想，我不是你中办警卫局的人，我是铁道部专运处的，干嘛也让我呆在学习班？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高成堂，要求回原单位。

杨：高成堂是汪东兴的秘书。

程：高成堂很快回了电话，告诉我：汪主任同意你的意见。还让我选择“留警卫局服务处，还是回铁道部

专运处”，后来我经过考虑，我说我回专运处，不去服务处。怎么办呢？从学习班出来我回到家，我那个老婆哭得厉害，就是把我弄到学习班以后，到10月份不是天冷嘛，我老婆叫我儿子去送棉袄，给我往钓鱼台国宾馆送，钓鱼台的工作人员说没这个人。又过了几天，说不行啊，天冷了没有棉袄哪行啊？我老婆又拿棉袄叫儿子往中南海去送。到中南海西门又说没有这个人。那这一下子完啦，找不到人啦！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在学习班，规定不让写信，也不准往家打电话。同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家里找不到我，当然十分着急。一想到这些事，我老婆就坚决反对我再去中南海工作，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了，所以从学习班出来就又回到了铁道部专运处。

◇ “你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合你”

杨：程师傅是当时咱们中国唯一既通晓中餐又通晓西餐的双料特级厨师，全国就他一个。

李：是啊，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里就称您是“国宝级烹饪大师”。

程：我原来在铁道部专列上当厨师，从1954年起，毛主席乘专列外出时，我经常给毛主席做饭。1956年，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诗词中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我做的。1956年我从铁道部专运处调到毛主席身边任厨师。1961年之前，我一直给毛主席当厨师。之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一直给江青当厨师，偶尔也为毛主席服服务。

江青是最难侍候的，给她当厨师，有的干一天就离开了，有的干长一点，也干不了多久，就得被换掉，但我却给她当了16年的厨师，直到她倒台为止。不是说我技术多高明，江青她自己就亲口跟我说“你技术也不怎么样，但是我就合你”。我就觉得怪可笑的，她说她就合我。

李：她还有点儿将就的意思？

程：哎，她就那个意思。不谦虚地说，在厨师行业，我应该算是合格的。在做人方面，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对我评价不错。不论对谁，我都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

杨：程师傅看问题很有见解，是诸葛亮。我常到厨房找他聊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飞来横祸之前，叶群像走马灯一样往江青那儿跑，跑了四五天，以后不跑了。正跑的时候程师傅就跟我说：“你看吧，中央又快要出事了，你看这个叶群跟走马灯一样往这儿跑，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哎哟，没几天，杨、余、傅就完了。林彪逃跑后，程师傅又跟我说：“江青这个人哪，将来肯定没有好下场，她整人整得太多啦！”

李：您怎么知道林彪这事跟江青会有关系呢？

程：其实我在厨房里头根本不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事情，有些事情仅凭叶群那个人的表现来判断。一般老百姓讲“无事不登三宝殿”，叶群要是没事的话他绝对不会突然地往江青那儿跑，人家休息她也打电话问，人家不是办公的时间她也要见，这都不是正常现象。

郑：叶群一般不往人家里跑？

程：江青是毛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当时即使有将军想巴结她都难见到，不是说随便就能见面的。

郑：叶群过去也不是老到江青那儿去吗？



杨：江青要不允许她去，她一般不去。

程：那时候叶群没少去江青那儿，江青要不在的话，她去了跟工作人员说话客气着呢。

阎：叶群确实对我们非常客气，就是给人的印象显得有点猥琐，她不注重打扮，经常披着个毛衣，个子也不太高，后来看到不少材料说她工于心计，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江青怕风怕光线。她每次乘车都要用一个绿塑料布罩在整个汽车上。

李：程师傅，江青这人平时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不把她当成一个大人物，你觉得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

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江青不像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那样。作为她个人吧，不缺这个，又不缺那个，什么都不缺。你说你那么大的一个人物，要在过去来讲也是个皇后了，但是一遇到事她那个性格相当的暴躁。我心里曾想过，她为什么那样暴躁，是不是更年期啊？是我自己这么想，当然谁也没在下边议论过她更年期的事。

郑：江青五六十年代不是那样，她那个时候也没有很高的职务。您是1956年到毛主席家的吧？您当时是不是觉得江青还好？

程：在当时来说能过得去。为什么呢？她一般没什么要求，挺节省的，会计划，吃东西一般也是按主席讲的去做，不是大吃大喝的主儿。你看她穿衣服也是那样，比如今天你见她穿的是一身旧的长布拉吉，她明天就能找个裁缝把这个布拉吉，按照她的点子，改个式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刚做的新衣服。她手挺巧的。据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穿的毛衣啊，都是她织的。她跟我们也常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许多书稿和文章，都是她抄的。江青的字确实不错，李讷的字也写得挺好。李讷平时也讲，家里没有学校，主席没有时间教她，妈妈教她。服务科有个姓周的，叫周少林，老头子，长征的老干部，他原来是给主席做饭的。周少林就是个厨师，最后让我们给顶替下去了，后来他不做饭了，就当管理员了。他说他那时候给主席江青他们一家做饭的时候，他自己给他们买粮买菜，买回来再给他们做。他说江青那时候生活条件也挺苦的，他蒸好的馒头她揣上两个，连菜都不要，就出去搞宣传去，一天不回来了。

江青跟林彪的习惯有点像，林彪怕风，江青也怕风，外边要是风，敞着窗户不行。怕声音，他俩也一样。她怕的东西跟林彪怕的都一样，怕风怕光线。江青有一段在上海的时候，坐的是个吉斯车，你猜怎么着？她当时在锦江饭店办公，锦江饭店对面有个俱乐部，本来不远的，她每次都得乘车到那儿去，并且要用一个大绿塑料布罩在整个汽车上。

李：整个汽车都罩上啦？

程：罩上啦，除了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基本上就能看到前边的道儿。不罩上不行，当时她怕阳光怕到那个程度。

李：那是哪年啊？

程：大概是1958年、1959年。

杨：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汽车用布罩上开着走。

程：是罩上，她在上海兴国路住的时候也是这样。

◇ “江青不整我，一方面是我凭着我的手艺，一方面是否与我整过她有关”

李：那时候她脾气坏吗？

程：没像后来表现的那样，但是那时候有些护士也不大好对付她，好像有的护士她挺喜欢，护士对她感情也挺好。但她对有的护士就不怎么好。

李：那时候的江青还好侍候是吧？

程：哎，那时候要比后来好侍候得多，但到最后，即到1974年、1975年以后，我看她对生活上的要求也不那么太苛刻了。

李：她可能心思也不在这上面了？

程：哎，不在这上面了，什么吃啊穿啊住啊，她不考虑或考虑得少了。她那时候只想当官了。她不提这些生活上的东西，与她想当官有直接关系。那时候，她的关注点是什么呢？比如，主席病重的时候，她有时也守候在游泳池，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央提出要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供人瞻仰。江青却提出，主席有遗嘱啊，说死后要火化，骨灰放到西山上去。她不赞成建毛主席纪念堂。

郑：江青不赞成建毛主席纪念堂？

程：是这样的。

李：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听说您比较了解江青的脾气，还经常跟江青斗斗智慧什么的，比如在做菜问题上，您给我们讲讲。

程：徐涛，也就是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丈夫，曾经是江青的保健医生，以后被提为解放军305医院的院长。他在担任江青保健医生期间，江青为一点小事，把他尅得直哭。我知道后，就给他做工作。江青尅你几句，这算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人了，为这点事哭不应该。我说你看我哭过吗？告诉你她有时候也尅我，她说今天的菜咸了，我说好，我叫你喊咸。下一次我给你做一个合适口味的菜，其他的菜不给你放盐，我叫你吃。她要淡了，我就给她多放点盐。我真给她这样做。这样整她几次，她就不会鸡蛋里挑骨头，轻易喊咸或淡了。

李：您不害怕啊？不怕她整您啊？

程：她还真不整厨师。

李：您觉得她为什么不整你啊？

程：谁知道她啊！她是不是担心整了厨师，厨师一撂挑子，没人给她做饭、吃不上饭了？她是不是这样想的？这只是估计。

李：不会吃不上饭，很可能是吃不到可她口的饭。

程：我担任江青专职厨师前，是一个姓廖的老师傅，跟着她将近10年。我跟她是最长的，16年。江青不整我，一方面是我凭着我的手艺，认认真真地给她做饭，一方面是否也与我整过她有关？比如她说菜咸，我就给她弄一个口味合适的，其他的菜不给她放盐。她品了这些菜，叫服务员拿着到下边去叫大家尝，有时候沈同值班，有时候孙勇值班，他们都是警卫啊，他们尝完了，又送到厨房，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尝尝这个菜”。他们都知道这里面的缘故。江青直接找我的时候少。原来跟江青的那个廖师傅，几乎没有一顿饭不挨江青批评

的。

◇ “一切以她的要求为原则，这样做，她就抓不住我的毛病”

李：您说的什么时候？

程：在我之前，廖师傅没有一顿不挨江青批。她不是嫌这个菜咸了，就是怨那个菜淡了。江青不吃葱、姜、蒜，这是真的。但是一碰到烧鱼的时候廖师傅偷偷摸摸地往里面放葱。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给廖师傅做工作。我说，这你就不对了，首长提出来了不吃这东西，你就别给她往里面放，那又不是你吃，是她吃，你何苦呢？她吃着没味儿，你再给她往里面放也可以啊——她也没提出说没味儿啊？人家就要求那个嘛，你要按人家的要求办。江青辣椒不吃，羊肉不吃，狗肉不吃，鳝鱼、泥鳅不吃，甲鱼不吃，葱、姜、蒜不吃，这些人吃不吃的东西，都要好好记住，不吃就不给她做，不给她放嘛，这样才行。

我给江青做饭，经常好几个星期得不到休息，家里碰到点急事也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时管理员也请来外边的厨师顶替我一天，让我回家休息休息，处理处理自己的私事。但江青吃惯了我做的饭菜，对于顶替厨师做的饭菜一吃就能知道不是我做的。所以非特殊情况，我不会同意请别的厨师顶替我。韩阿福师傅是给毛主席做过几十年饭的有经验的高级厨师，有一次管理员让他顶替了我一天，江青一吃感到不对，说“今天的饭不是程师傅做的”，她下来一问知道是韩师傅做的，就说“以后别让韩师傅给我做了”。有一次管理员将北京饭店的名厨师陈师傅请来替我一天，江青一吃，就说“这不是程师傅做的”，“以后别让他做了”。

有时候管理员想请大会堂的师傅替我一天，但他们了解江青，都不敢替我，怕挨训。鉴于这种情况，我想算了，以后我也不休息了，也不用请别的师傅顶替我了，我家里不就一个老婆、两个孩子吗，事情也不多，即使他们有事，也让他们尽量自己解决，尽量不用我处理。有时家里来客人，来就来吧，能见就见，不能见就算。有时家里碰到困难，就自己解决或克服吧！否则，请外来厨师顶替我的次数多了，江青非得发火不可。我在给江青做厨师的长时间里，白天、晚上都在她工作的驻地休息，时时坚守在厨师的岗位上，保证随叫随到。

我给江青做饭掌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她喜欢吃的东西我就给她做；她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就不给她做；她喜欢吃清淡的口味，我就照她要求的清淡口味做；偶尔她有特殊的口味要求，我就按她特殊的口味要求做。总之，一切以她的要求和满意为原则。这样做，她就抓不住我的毛病。

郑：你主要给她做中餐还是西餐？

程：中西餐都做，那时候我给她做好多东西啊！她吃的那个点心挺难做的，一般的厨师不大会中西点心，会中点的厨师啊不一定会西点，会做点心的厨师又不一定会做菜，我不仅会做菜又会做点心，我不仅会做中餐又会做西餐，我学的面是很广的。西餐的做法跟中餐不一样。西餐要转下来，什么叫转下来？会做汤，会做菜，凉菜、热菜都要做，还要去做面点心，转一圈，都得会了。中餐没有转的，中餐学的炒菜就是炒一辈子菜，其他的不会。中餐与西餐的路子不一样。

郑：江青喜欢吃什么？

程：江青喜欢吃的东西一是清淡，二是南方口味。比如说她吃小鸡，她就喜欢吃拳头大小的雏鸡，很嫩，你怎么给她做她都吃，什么面条鸡啊，铁扒鸡啊，她都喜欢吃。我随江青到海南岛去，我还给她做过椰子鸡。海南岛的椰子很多，给江青做椰子鸡，必须上午8点以前摘树上的嫩椰子，8点以后太阳晒过的椰子，味道就变了。只有摘嫩椰子，里面的肉才能吃。我每次做椰子鸡，都是请人摘两个嫩椰子，先将两个椰子用厨锯锯开，把其中一个椰子里的水倒在锅里，将椰肉挖出来放在容器中，再放上黄油，用西餐的方法搅拌均匀，将洗干净的小雏鸡放到椰子水的锅里焗好以后，再将鸡和椰肉都放到另一个锯开的椰子里去，用锯下的那段椰子盖好，然后放蒸锅里蒸两小时，这道椰子鸡荤菜就做好了。这椰子鸡的味挺香的，她一个人就全报销了。毛主席和江

青吃东西都不浪费，都不是大手大脚的。一个椰子鸡这个荤菜就可以了，再做两个小菜。她吃的那小菜很少，一点儿。虽然量少，这样的菜却不大好做，为什么呢？既要叫她吃饱，又要叫她吃好，这点儿数量限制你，挺费劲的。

郑：主食江青主要吃什么？

程：一般她一天能吃一顿米饭，带点心的东西吃的多一些。喜欢吃甜的，但是你不能给她做太甜了。点心类的东西、布丁类的东西都可以吃。一般来讲，晚上这顿她必须吃米饭，每天第一次起床她吃麦片粥啊，那时候她就喜欢吃麦片。那时候咱们中国老百姓还不大懂那个。为什么我懂呢？因为我从小学西餐，这些东西都有。过去，江青早晨起来吃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稀米粥啊麦片粥啊，现在不都是这个羹那个羹，这个酪那个酪的。

郑：江青啥时间吃早餐？

程：江青吃早餐的时间，每个阶段不同。在“文革”期间，她的作息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毛主席转，晚上办公，上午或下午休息。因此，她的早餐时间，上午下午都存在，但上午7至12时吃早餐的时间居多。

李：每次现吃现做？您不可能做好了等着？

程：主席和江青都是现通知现做，你半个小时一定得把饭菜给搁到餐桌上来。焖饭半个小时挺紧张的，就这么点儿时间，必须得提前将能早准备的工作都准备好。江青吃的那个鸡，是很费事的，一个小时都做不出来，必须得早做准备。

郑：她还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吗？据说，她喜欢吃那个大鲫鱼。有人讲大鲫鱼供应站就给她和总理吃，别人谁也不给，是这样吗？

杨：鲫鱼没有大的，一斤多重的都很少。

程：大鲫鱼不好找。“文革”那时候说北京中山公园有个水洞里头老有那么大的鲫鱼，一捞就捞上来了。一般的说，北京巴沟渔场里，那么大的鲫鱼很少，小鲫鱼多。我用北京的烹调法子酥好了，做成凉菜给她吃，她也可以吃，吃的还不少。

李：她有没有哪顿饭吃高兴了，说“跟程师傅说说，今儿这饭真好”？

程：高兴的话，她一般也不会说“这饭真好”，因为她在吃饭前，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在吃饭过程中，大脑逐步趋于高度抑制状态，她哪还有兴趣评价你做的饭菜好与不好啊！

郑：江青除了爱吃鲫鱼还喜欢吃什么？

程：江青除了爱吃鲫鱼、小雏鸡外，一般地讲吃点儿烤鸭也可以。烤一只鸭子，她一个人吃不了。你一买就得买一个鸭子，买半只鸭子的时候也有。有一次我到供应科订了半只鸭子，那时候供应科也很注意节省啊，我订了半只，那半只供应科最后卖给了警卫局局长张耀祠了。到了晚上江青提出要请客，我一看这鸭子不够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供应科，我说你别把那半只鸭子处理了。供应科那时候自己绝对不敢吃，他们说哎哟，糟糕，那半只鸭子卖给张耀祠了，刚送走，要不要追回来？我说算了，你送去以后再跟人要回来不合适。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多做点儿小菜应付过去了。

郑：蔬菜她喜欢吃什么？

程：她吃蔬菜也分年代和季节。“文革”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大便干燥，她就喜欢吃那个菠菜泥儿。做菜泥儿时，我将奶油黄油搁里头，菠菜泥儿啊胡萝卜泥儿啊这些菜她都喜欢吃，素菜她一般喜欢吃油菜、芥菜，带叶的菜她吃的少一些。以前主席家里带叶的青菜不少，什么苋菜啊空心菜啊都有，但她吃的不多。过去这些菜市面看不见，都是从南方买的种子，在北京农场特别种的。

郑：江青喜欢吃的那些菜也是专门种的吗？

程：是专门种的，有个农场。

杨：北京玉泉山有个8341部队农场，西郊还有个巨山农场。

程：玉泉山农场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实际就是专供中央书记处的，够他们吃的。

◇ “供应科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服务的优秀人员，不可能有投毒问题”

李：民间有一个说法，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有，说皇家吃的食品过期没过期啊，坏没坏啊，有毒没有啊，必须用银勺儿试试，有这回事吗？

程：没用这个检验方法，实际上也不需要。因为江青吃的东西，我都是前一天订货，当天从供应科买回来。供应科供应的东西，比如猪肉，是当天杀的，鱼都是活的，鸡是刚宰的，不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再说，供应科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全心全意为中央领导服务的优秀人员，不可能有投毒问题啊！

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供应科，现在叫供应处，就是科成了处了。最早的时候供应科的特供范围是常委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啊，江青属特殊照顾，就包括在内，后来供应范围扩大到政治局，她更没问题了。部以上的领导人，北京市有一个供应站，在东华门。

程：包括北京饭店这些大的一些宾馆都可以到北京市供应站订货。

李：总之和市面上没关系，自己内部循环？

杨：对，什么钓鱼台啊大会堂啊，都到那个供应站去买。

阎：老母鸡，江青光喝汤不吃鸡吗？

程：对，有时候是这样，我从供应科订半只老母鸡煮汤，煮汤之后的鸡肉一般的再退给供应科出售给本单位食堂。再有的时候捞出来，搁点儿酱油一拌，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实际上江青不知道给他们吃了。

李：要知道了她会怎么样？

程：可能会批评——不过还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李：江青很在乎这个吗？

程：她很在意。因此，我们都在工作人员食堂吃饭，唯恐“说不清”。即使这样，有时江青还突然检查一下我们吃的是否简朴。例如，在上海时，有一天吴阶平大夫、邬吉成副局长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工作人员食堂吃饭，桌子上有肉、有菜，还摆着西瓜，突然护士小周给我打电话，说江青向我们工作人员食堂走来了。小周挺精的，她打电话的目的是提前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该回避的回避，免得节外生枝。我接完电话后，立即

将两盘好菜搁进橱柜里头，一盘西瓜也搁进去了。她来到食堂进门一看，饭桌上没什么吃的，扭头就走了。大伙就笑“程师傅太了解江青这个人了”。

李：她干嘛要来看你们吃什么啊？

杨：我估计她是怕当地官员把我们收买了，吃得太好。

程：嗨，最后她走了，我把这两盘菜拿出来，一盘西瓜也拿出来，他们说你真逗啊。我说不回避一下不行啊，你叫她看到了吃那么好，她真火儿。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干什么啊，是吧？

□ 原载《湘潮》2014年第1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